七日談（澳門篇）

濠江啟智：孫中山思想裏的澳門基因

吳志良

澳門與孫中山的緣分，比教科書裏寫得更早、更深。

翠亨村離澳門不過數十里水路。鄉間老人傳說，孫中山的父親孫達成年輕時曾在澳門板樟堂一帶做鞋匠，暮年歸鄉，燈下給孩子們講得最多的，是「澳門口那片海」——帆檣林立，鐘樓與廟宇比鄰，洋人、葡兵、華商、傳教士在同一條街上討生活。童年的孫眉、孫文兄弟，對「澳門」二字並不陌生。可以說，在走出香山之前，澳門已經是這個家庭精神版圖的一部分。它不是一個抽象地名，而是父輩口中可感可觸的「外面世界」：有海風，有鐘聲，有異域面孔，也有華洋雜處的市井煙火。

這便解釋了後來的事：為什麼是澳門，而不是廣州或香港，最先接住了那個想「借西學以革新」的少年。

澳門從來不是普通的口岸。它是西學東漸的前哨，是中國最早、也最持久地接觸西方近代文明的窗口。葡萄牙人帶來的不只有貿易與宗教，還有一整套不同於科舉世界的認知方式。一八三九年馬禮遜學堂在澳門辦學，容閎、黃寬從這兒走向世界；一八二二年《蜜蜂華報》在這裏印出中國境內第一份外文報刊；林則徐組織翻譯的《澳門新聞紙》，把世界地圖、萬國公法、蒸汽機與議會制度，第一次系統地搬進嶺南讀書人的書桌。澳門的意義，不只在於「通商」，更在於它讓一代嶺南讀書人第一次意識到：天下之外還有天下，科舉之外還有另一種知識秩序。

孫中山一八七八年從澳門乘船赴檀香山，是少年第一次見大海。他後來回憶，西學之衝擊不在一本書、一句話，而在「見其學校、見其醫院、見其街市」。澳門給他的，不是某條具體知識，而是「另有一種文明」的實感。如果說香港後來給了他系統的西醫訓練，廣州給了他行醫與社會的現場，那麼澳門給他的，是更早的文明想像和更寬的思想入口。

真正把這種實感鍛成思想的，是鄭觀應。

一八八六年，鄭觀應因洋務受挫，回到澳門龍頭左巷的鄭家大屋，蟄居近十年，寫定《盛世危言》。彼時孫中山正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假期往返必經澳門。兩位同鄉，一老一少就此對坐。鄭家大屋的燈火，照見的不是一般鄉誼，而是一種思想上的接引：一個久經洋務風浪的前輩，和一個正在尋找中國出路的青年，在澳門這個中西交匯處相遇了。

鄭觀應不是書齋裏的空談者。他做過招商局總辦、電報局總辦，跟盛宣懷打了半輩子交道，知道西方強在哪裏，也知道中國病在何處。《盛世危言》講「商戰重於兵戰」，講「設議院以通下情」，講「主以中學，輔以西學」——這些話，孫中山聽進去了。更重要的是，鄭觀應身上那種既懂實務、又敢言改革的氣質，讓孫中山看到「改良」不是紙上文章，而是一套可以操作、可以試驗的救國方案。

更直接的交集在文字裏。孫中山早年寫過一篇談農政的《農功》，經鄭觀應潤色，輯入《盛世危言》。這不是「收錄一篇文章」那麼輕：是一個青年被一個時代思想家認下、提攜、推到歷史前台。對孫中山而言，這既是鼓勵，也是思想上的確認：他的關切，已經進入當時中國改革話語的中心。

一八九四年春，孫中山草《上李鴻章書》，提出「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北上途中，他在上海拜會鄭觀應。鄭觀應提筆給盛宣懷寫信舉薦：「敝邑有孫逸仙者，少年英俊……其志不可謂不高。」信裏還替他申請遊歷泰西的護照。改良派的大門，是鄭觀應親手替他推開的。雖然上書最終未達預期，但這條由澳門連接起來的思想通道，已經把一個香山青年推向了更大的歷史舞台。

但澳門給孫中山的，不止一扇窗、一位師。

一八九二年九月，孫中山從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受聘澳門鏡湖醫院，出任新設西醫局首任義務醫師，也是澳門第一位華人西醫。他在鏡湖贈醫施藥，「不受分文」，遇赤貧者還自掏薪金配藥。澳門報紙後來登文，稱其「神乎其技」。鏡湖醫院的經驗，讓他直接觸摸到澳門華人的生計與疾苦：病床前有貧富之差，街市上有華洋之別，社會肌理裏的問題，並不因一座小城而稍減。

在鏡湖，他看到了病，也看到了「病的來源」。個體身上的瘡疽好治，社會肌理裏的潰爛難醫。他後來在《建國方略》裏回頭看這段日子，說得極乾脆：「懸壺於澳門、羊城兩地以問世，而實則為革命運動之開始也。」



◀澳門鏡湖醫院。 中新社

一八九三年，他與土生葡人飛南第創辦《鏡海叢報》——澳門第一份帶民主傾向的中文報紙。孫中山匿名寫社論，針砭時弊，講教育、講實業、講民智。報紙不大，卻是他「從醫人轉向醫國」的第一個公共講台。澳門的特別，正在這種「中西混血」的從容：西醫和中藥同在一張處方裏，葡文報與中文報排在同一條街，改良與革命可以在同一間茶館吵架。孫中山後來那套「三民主義」裏兼容並蓄的氣質，根脈其實在澳門。

從鄭家大屋的燈火，到鏡湖醫院的藥香，再到《鏡海叢報》的鉛字——澳門沒有教給孫中山「革命」兩個字，卻給了他三件更根本的東西：

一雙看世界的眼睛，一顆不肯認命的心，一塊可以試錯、可以說話、可以把想法變成行動的土壤。

沒有澳門，孫中山可能只是個好醫生；沒有鄭觀應，孫中山可能停留在「上書改良」的階段；沒有鏡湖與《鏡海叢報》，思想就永遠停在書桌上。澳門不是孫中山思想的唯一來源，卻是最早、最具體可感的觸媒之一：它把「世界」推到少年眼前，又把「中國」放回青年心中。

香山少年從濠江出發，帶走的不是某本秘笈，而是一種混合了嶺南務實、西學理性與華夏情懷的思維方法。這個方法，後來叫「三民主義」；它的胚胎，藏在澳門的風裏。

濠江之水不大，卻連通大洋。一座小城餵大一個改變中國的人——這事聽起來像傳奇，拆開看，全是歷史。

新疆沙漠裏的水產

自由談

明德

在家看無線新聞報道，介紹新疆如何在沙漠邊緣養殖水產。

電視畫面中，出現了塔里木大學的科研人員，他們提到團隊以當地豐富的地下鹽鹼水為基礎，透過「循環水智能養殖控制系統」，補充礦物質、平衡離子配比，調配成俗稱「人工海水」的環境。

報道中提到的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邊緣、塔克拉瑪干沙漠周邊的多個地點，包括阿克蘇地區烏什縣、阿拉爾市、喀什地區麥蓋提縣、和田地區和田縣、鐵門關市石門水庫，以及巴州且末縣，如今都成功養殖了青蟹、南美白對蝦和海鱸魚等水產。

看到這則報道，我想起今年九月北疆之旅的餐桌。那趟十二天的行程，我們從烏魯木齊出發，經過阿勒泰、喀納斯、伊犁河谷，最後再回到烏魯木齊。一路上，景色盡是沙漠、雅丹地貌、草原和戈壁，身處內陸，遠離海洋。

但在那幾天的團餐裏，出現過不少蝦和魚。我當時以為，在新疆這麼深遠的內陸，餐廳能提供這些水產，必定是經歷了漫長的物流供應鏈，從沿海城市長途冷藏運來，能吃到覺得很難得。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吃到的魚蝦，原產養殖場極有可能就在新疆當地，正是電視畫面裏提到的那些鹽鹼地。

新疆的地形常被形容為「三山夾兩盆」，其中的塔里木盆地，地貌主要是廣闊的沙漠和戈壁。但當地卻利用原本無法耕種的鹽鹼水，發展起水產養殖。

現在回想，當時餐桌上的蝦和魚，可能正是電視提到的南美白對蝦和海鱸魚。這背後，原來是新疆利用科技克服地理限制的成果。

朝陽的「中國尊」

如是我見

寧新路

一個陽光燦爛的清晨，我登上了座百層大樓，這是京城朝陽區的樓中樓，也是全城最高的樓，是被叫作「中國尊」的摩天大廈，它是世界知名企業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的總部。在這一百層的辦公室裏，曾經坐過和正在坐着的是一任任創造世界財富神話的人物。著名金融家、首任董事長榮毅仁先生曾帶着中信人乘風破浪，創造過中信「神話」般的業績。繼任他的歷任董事長，也是一屆傳着一屆敢打硬拚的風格。應股權董事岳學鯤邀請，走近了中信人。

不見「中國尊」不知道樓有多高。它應是京城回頭率最高的樓。每當我走在朝陽區光華路上，看到在陽光照耀下流光溢彩的「中國尊」，會讓我眼睛一亮並為之興奮。它最迷人的時候，是清晨和傍晚，它是朝陽區閃亮的景色。當晨光和晚霞照在「尊」上，它隨着霞光的色彩不停地變幻美妙風姿，便成了清晨和傍晚一道讓人陶醉的美景，更好像是饋贈給那些清早和傍晚忙碌的人們的美畫。

「中國尊」以鶴立雞群的高大和精緻絕美的造型引人好奇。為什麼建造這以尊為型的大樓呢，這「尊」裏是群什麼樣的人，他們為何有那麼多的奇思妙想？當我凝望這美尊的時候，一些好奇的想法，會在心裏打轉。



◀中國尊、望海樓等北京地標建築在晨光中與什剎海光影交錯。 資料圖片

於是就想到了「尊」的含義。尊的威嚴與高大，象徵着無與倫比的高貴。尊的型和意，是中國人的尊容和精神，是中華文化的圖騰。讓「尊」成為首都獨一無二的摩天大樓，不是建一道樓中樓的壯觀風景，而是要讓它成為北京作為國際化大都市的象徵，也賦予了它高遠的志向和非凡的寓意。想必要讓這「尊」的文化圖騰成為獨特理念，想必要讓這獨特的「尊」成為創新的旗幟，讓它引領首都的經濟方舟，搏擊世界經濟大海的潮頭，從北京出發，從中國出發，遠航到夢想的天際。

這是國家為一個新誕生的企業建造京城無雙的「獨尊」，它的確要讓入駐這「尊」裏的人，為改革開放的中國打開世界金融窗口，讓世界的金融走向中國，更讓中國的金融走向世界。

而這座「尊」裏人們的神秘，是在這日夜燈火輝煌樓裏，總有人在不分日夜地做事。總有它的金融和實業機構在中國各地和世界各國掛牌開張，總有它的資產獲得神話般效益的連年喜事，總有它的金融和實業產品闖入人們眼簾和生活，且成了國家金融產業的「航母」，在全球的「存在感」越發耀眼，更在經營上不停地創造神奇故事。於是就讓人望着這高大的「尊」想，這「尊」在一些人看來僅僅是座漂亮的高樓，坐在這樓裏的人，定是穿着漂亮的衣服，做的是上班一張報紙一杯茶的輕鬆工作。這個猜想肯定錯了，只要是對這群人和他們的事業略加了解，就會知道：這高大的「尊」，其實是座超級的經濟「航母」，它急行在引領中國企業創造奇跡的經濟大江大河裏，更是急行在世界四面八方的大海裏，「尊」裏的人都是金融戰場的戰士，是每時每刻衝鋒在金融槍林彈雨裏的戰士。他們與世界上最厲害的金融敵人較量，與市場上最強大的對手搏鬥，「尊」裏大小辦公室裏，沒有槍炮，卻皆是看不見的槍炮在激戰，到處是沒有硝煙的戰場。「尊」裏的人是金融戰士，他們流的是看不見的血，犧牲的是看不見的身體。這座「尊」裏，每天「戰事」不斷，每天「硝煙」瀰漫，演繹着令人驚心動魄的金融故事，創造出了天方夜譚般的神話傳奇。

這座「尊」嶄新且昂首挺胸，人也總是青春亮麗。一代又一代的中信人，把「尊」當作夢的搖籃，把「尊」當作成為英豪的戰場，用他們的滿腔熱血和才智，搏擊在國內外金融實戰的最前沿，創造了讓人難以置信的「神話」。從這「尊」裏出發，經營的觸角伸到了中國國民經濟的所有領域，且進入的幾乎都是「刀兵」相見的你死我活的行業，靠實力「殺」出一條「血」路，繁衍出兩千多家企業。一座「尊」的「身影」到了全球，這該是什麼樣的規模，又是怎麼的經濟效益？從容的中信人說，有令他們自豪的兩個數字，足以說明這座「尊」無愧是經濟「航母」，把四十多年前的國家投入，「放大」到了三萬多倍，資產「放大」到了近兩千倍。

「中國尊」的高度是朝陽區建築的傑作，也是北京又高又美的風景。北京的朝陽區是京城最早見到太陽的地方，「中國尊」是朝陽迎接朝陽的最高建築。它在所有樓群中的超凡高大，給朝陽繁華增添了自豪和自信，也給朝陽的經濟社會增添了不可想像的寬闊和活力。

在皇宮食堂吃飯（上）

域外漫筆

魯力

多年前，我與鳳凰衛視的何亮亮一起，應俄羅斯外交部的邀請，訪問莫斯科。主人知道我們對俄羅斯歷史感興趣，第一天的行程就安排我們參觀了克里姆林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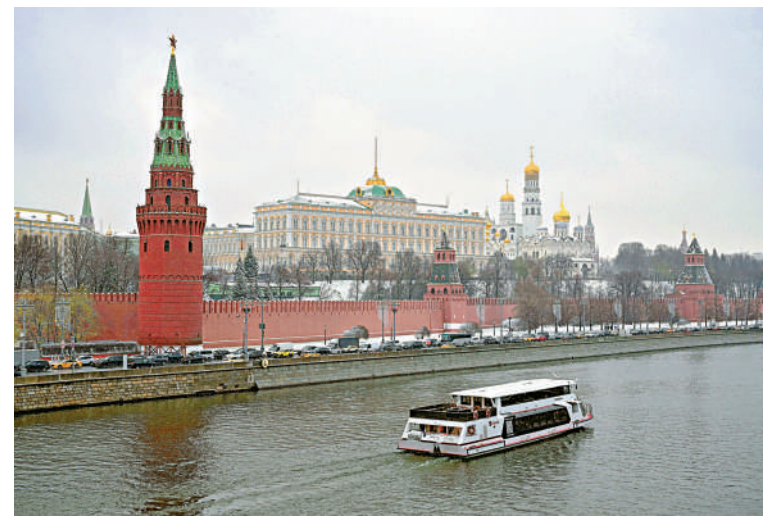
去莫斯科之前，我對克里姆林宮的想像，無非是紅牆、鐘樓，以及塔尖上那顆沉甸甸的紅星。可是一進入克宮，映入眼簾的居然是一座又一座的教堂。外交部的陪同翻譯烏斯諾娃告訴我們，在蘇維埃歷史時期，列寧、斯大林這些革命領袖居然能容忍教堂在克宮內的存在，他們平時與牧師一起在克里姆林宮裏上下班。

當我進入天使長主教座堂時，裏頭光線昏暗，涼颼颼的。眼睛適應了一會，才看清地上擺着一具又一具的棺木。導遊說，這是沙皇們的靈柩。從伊凡雷帝到彼得二世，好幾百年的人物，就這麼一個挨着一個地躺着。革命者把沙皇推翻了，但卻沒有把他們的屍骨扔出去。他們還在克里姆林宮裏躺着，與斯大林、普京的辦公室隔着幾堵牆。政權中心可以與教堂並存於一隅，這也是俄國政治的一大特色。這地方，活人與死人，革命與舊朝，就這麼平和地一起過日子。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前蘇聯，年齡稍大的一輩人都會記得，蘇共領袖赫魯曉夫說過的一句話：「土豆燒牛肉就是共產主義」。細心的主人於是安排我們，中午在克里姆林宮原蘇共中央委員會食堂裏吃飯。烏斯諾娃安排我們坐在當年赫魯曉夫坐過的位置上，吃土豆燒牛肉。那是一張普通的圓形柚木桌，環桌擺着八張柚木製帶巴洛克風格的靠背椅。其實，俄式的土豆燒牛肉與中國的不同。它不是一道硬菜，而是一種羹。據克里姆林宮主廚維克多・別利亞耶夫介紹，這道羹最特別的地方在於，所用的牛肉必須先用黑胡椒、紅酒和雞蛋一起醃製。土豆更是要事先炸成金黃色備用，然後用慢火熬成濃湯。炸過的土豆再跟小牛肉一起燉，小火慢燉一個半小時。湯濃了，土豆芯還是麵的。

我拿勺子舀了一口湯，綿、軟、燙、鮮，黑胡椒的美味與紅酒的香味交相融會，再與土豆的微甜一合，入口即化。我拿起一片黑麵包，在上面抹了一面的魚子醬，咬上一口，鮮、甜，有股海鹽的微鹹，又吃到小時候魚肝油的味道。維克多給我們一人倒了一杯伏特加。吃着魚子醬黑麵包，喝着土豆燒牛肉羹，品着伏特加，我對亮亮兄笑道，我們已經進入共產主義了。

出了食堂不遠處，就是黃白兩色的舊蘇維埃議會大樓，現在是普京總統的辦公室。我走到離辦公樓約十米處站下，以辦公樓為背景拍了一張照片。辦公樓的旁邊有個小花園，林木蔥鬱，花草繁茂。烏斯諾娃告訴我，花園靠牆的那棵大樹是前蘇聯宇航員加加林從太空帶回來的樹種栽種的。眼前的這棵樹枝繁葉茂，樹冠高大，生機勃勃。不過，物是人非。「土豆燒牛肉」式的共產主義，已成為歷史了。



◀十一月十八日在俄羅斯莫斯科拍攝的克里姆林宮及莫斯科河沿岸雪景。 新華社